

“道歉”的语用研究及对 Meier “修复工作”的完善

蒋景阳, 胡 蓉

(浙江大学 应用语言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 道歉行为在语学里是一个热门话题, 研究方向大体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在“礼貌/面子”理论框架上进行的, 第二种持“修复”观点, 以 Meier 为代表。后者建立在批判和继承前者的基础上, 是目前较为流行的, 并且沿袭了受到公认的分析道歉行为的理论思路。但是, Meier 的“修复工作”仍旧无法完美地解释中国语境下的道歉行为。一方面, 对于道歉的起因, 中国式道歉可能并没有违反社会规范, 或者道歉发生在违反社会规范之前; 另一方面, 对于道歉的结果, 除了 Meier 提出的“修复”, 中国式道歉还能达到“美化”的效果。而且中国式道歉还有可能是“反”和谐的, 从而导致中国人的道歉频率比较低。总之, Meier 的模型有待修改, 从而适应中国式道歉的特殊性。

[关键词] 道歉; Brown 和 Levinson; “修复工作”; “和谐”; 中国式道歉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170-942X(2005)06-0170-07

道歉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 本文所讨论的是广义的言语形式上的道歉, 根据 Al-Zumor, 它包括多种策略, 如 (1) 使用显性施为句, 像“我错了”、“请原谅”等; (2) 对发生的情况或原因做解释, 像“路上堵车”、“我闹钟坏了, 所以起得很晚”等; (3) 表示承担责任, 像“都是我的错”、“怪我太粗心了”等; (4) 向对方表示关心, 如“伤着你了吗?”、“让你失望了吧?”等; (5) 表示愿意弥补过失, 如“损失由我承担”、“明天我再买个新的给您”等; (6) 保证永不再犯, 如“我发誓下一次不会再这样了”、“今后一定吸取教训”等^{[1] (p.6)}。

近年来, 各个领域的语言学家们(包括语用学、语言习得、跨文化交际、话语学等)从不同的角度(包括功能、发展、类别、效果等)对道歉进行了研究, 主要是以 Brown 和 Levinson 的“礼貌/面子”理论为基础的一些研究和以 Meier 为代表的“修复”理论。但笔者认为, 他们的成果大都只是西方社会背景或者英语语言环境下的产物, 往往忽视了其他文化和语言中道歉的差异和特殊性。因此, 本文从语用学的角度出发, 力图挖掘出中国式道歉的本质, 并从中国式道歉为出发点, 对以 Meier 为代表的“修复”理论进行补充与更新。

一、两种研究道歉的方向

语用学领域对道歉的研究思路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建立在 Brown 和 Levinson 的“礼

貌/面子”理论基础上。另一种是以 Meier 为代表的“修复”理论。

(一) 道歉与 Brown 和 Levinson 的“礼貌/面子”理论

Brown 和 Levinson 认为, 道歉是一种交际活动, 在这个活动中, 道歉者要表现出礼貌, 所谓“礼貌”, 不仅是语言上的表达, 更重要的是关注被冒犯者的面子需求。Brown 和 Levinson“礼貌/面子”的基本观点包括三个概念: “面子”、“威胁面子行为”和“礼貌策略”^{[2] (p. 187)}。的确, 根据常理, 道歉很容易跟“礼貌”这个词联系起来, 加上 Brown 和 Levinson 的“礼貌/面子”理论在语用学领域的影响力, 研究者曾一度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此理论框架来研究道歉。

但是, 看似完备合理的“礼貌/面子”理论在用于研究道歉时遇到了困难, 现出了分歧。分歧主要有两点: 首先, 道歉究竟是礼貌行为还是“威胁面子行为”? Brown 和 Levinson 在定义道歉时提到“关注被冒犯者的面子需求”, 可见, 他们认为道歉是一种礼貌行为, 但是, 换一种角度也可把道歉看成是道歉者在请求对方释罪。道歉一旦同“请求”这个言语行为联系起来, 它就成了—种“威胁面子行为”, 它请求听话者“原谅”, 威胁了听话者的行为自由, 或者称作“消极面子”。其次, 倘若暂且承认道歉是一种礼貌行为, 那么, 它应该算作“积极礼貌”还是“消极礼貌”呢? Brown 和 Levinson 认为, 道歉是“消极礼貌”, 通过道歉, 道歉者表明他不愿侵犯听话者的消极面子^{[2] (p. 187)}。可是, 道歉在某些情形下也可以看作是道歉者在向接受道歉者表示好感、认同, 这不正是“积极礼貌”的表现吗? 在这一点上, 语用学家分歧很大。例如, Leech 将道歉归到“积极礼貌”^{[3] (p. 133)}, 而 Holmes^[4]则发表折中观点, 认为道歉同时兼顾了听话者的“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需求。

正因为 Brown 和 Levinson 的“礼貌/面子”理论在解释道歉时出现了很多问题, 语用学者不得不另辟蹊径来研究道歉。同时, 这也引发了一系列对整个 Brown 和 Levinson 的“礼貌/面子”理论的质疑和批判。

(二) Meier 的“修复工作”

一种对道歉的新研究是以 Meier 为代表的“修复”派。Meier^{[5] [6] [7] [10]}多年来分析甚至抨击 Brown 和 Levinson 的“礼貌/面子”理论。她认为, Brown 和 Levinson 的“礼貌/面子”理论的局限性主要有两点: 第一, Brown 和 Levinson 视“礼貌”为“重新调整威胁面子行为”(performing an FTA with redress), 换言之, 礼貌是“威胁面子行为”经过加工、包装后的替代品, 这样一来, “礼貌”的存在必须以 FTA 的存在为前提。但事实上, “礼貌”并不依赖于 FTA, 是否“礼貌”取决于言语策略的实际运用结果, 即礼貌的本质体现为恰当地运用这些言语策略。就道歉来说, 在没有经过现实的语境检验之前, 讨论道歉是“礼貌”还是“非礼貌”(即 FTA)其实是徒劳无功的。应当说, 经过语境检验运用得当的道歉就是礼貌的; 反之, 不合时宜的道歉就会构成 FTA。第二个局限是, Brown 和 Levinson 认为“礼貌”是服务于听话者的“面子”的。但是, 人类真能如此“舍己为人”, 凡事都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吗? 这多少有高估人类道德觉悟之嫌。而实际情况是, 人大多是唯“自身利益”是图的。以道歉为例, 与其说是为了听话者的“面子”(暂且不去追究是“积极面子”还是“消极面子”), 不如说是道歉者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比如, 为了能在社交圈里留下一个有教养、明事理、可以信任的好形象。Leech 打趣地将礼貌的目的描述为“如果你对邻居不礼貌的话, 你就借不到他的割草机了。”^{[3] (p. 82)}

由于上述两点局限, Meier 抛弃了“礼貌”, 转而推崇“恰当”(appropriateness)。她认为, 在“恰当的场合说‘恰当’的话才是我们真正追寻的会话原则。这与我国学者索振羽的得体原则

① 参阅 Meier, A. J. Has 'politeness' outlived its usefulness? Vienna English Working Papers (VIEWS), 2004 (13): 5-22.

(tactfulness)不谋而合。索先生认为,在保留格赖斯“合作原则”之外,还有必要提出一个高层次的有普遍性的“得体原则”。所谓“得体”是指说出的话适合不同语境的需要,采用了拐弯抹角(间接)方式,而交际效果最佳^[8](pp.87-89)。

在“恰当/得体”的大框架下,Meier将道歉重命名为“修复工作”(repair work),她认为:“修复工作”(即道歉)是当说话人认为自己的行为跌落到特定群体的道德指标之下,有可能给自己的形象带来损伤时,产生的一种为修复形象损伤的行为^[5](p.388)。她在一篇论文^[7]中,将道歉的产生过程表示成:

说话者形象=>说话者违反了社会规范=>说话者形象受损=>道歉=>说话者形象得到“修复”

笔者认为,Meier的“修复工作”与“礼貌/面子”框架下的道歉研究主要有两方面的不同。第一,Meier的“修复工作”建立在说话者而不是听话者的立场上,这让道歉的本质更明晰化。事实上,考察“apology”的词源“apologia”(apology),在古希腊指的是被告在法庭上的辩护词。这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apology”从一开始就是说话者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其次,Meier认为:“修复工作”的目的不是Brown和Levinson理论里所说的为了降低“威胁面子程度”,而是“重建和保持原有的社会和谐关系”^[5](p.388)。这就好比人际交往的画卷里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污点,需要我们适当地添上几笔,使不和谐“消失”,让画面重新恢复和谐和美感。这里,适当添上的几笔说的就是Meier所说的“修复工作”,或通常所说的“道歉”行为。

近年来对“道歉”的研究大部分都抛弃了Brown和Levinson的“礼貌/面子”理论,转而趋向“恰当”、“修复”的观点。但笔者认为,Meier的“修复工作”是在认清了Brown和Levinson的“礼貌/面子”理论局限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这个框架未免有笼统、片面之嫌,还需要研究者们完善甚至修改,尤其要根据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对道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笔者试图从批判性的角度重新审视Meier的“修复工作”,通过深入比较中国道歉与西方道歉的差异,进而说明中国式道歉的特殊性。

二、中西道歉差异及对“修复工作”的再思考

(一)“修复”的导火索

根据Meier对道歉行为的产生原因的分析,“修复”(repair)一词至少有两层隐含意义:a.有过错存在;b.这个过错已经发生。或者说,道歉的“导火索”是原来和谐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不均衡。只有这样,才有随后的所谓“修复”工作,目的是恢复原先和谐的状态。但是,这只能解释西方国家中最普遍的道歉行为。笔者根据中国的文化和交往实际,对以上两点提出疑问:针对a条件,一定要有“过错”发生吗?

让我们来看以下的对话:

(1)甲是乙的朋友,一天乙到甲家做客,甲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

甲:实在不好意思。今天准备不够,随便几个家常小菜,大家将就着吃吧。还望多多包涵。

几乎每个中国主人都会在饭前对客人说这样一番客套话。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道歉”,主人在请求客人原谅他的招待不周。经常有外国人信以为真,而入席后看到丰盛的菜肴他们不禁纳闷:先前的道歉是为何?值得语言学者注意的是,多数中国主人在做这样道歉时,其实是在故意“说谎”,他们很清楚自己准备的饭菜是拿得出手的,可能还会大受好评。但是文化礼节和传统无形地规制着主人做此道歉。虽然没有“过错”,但如果不说这番话,在中国人看来就是不礼貌的。“无中生有”式的道歉在中国是很普遍的,第一次见面说“有失远迎”(事实上做了充分的迎接工作),帮人家修好了电脑时谦虚地说“班门弄斧,让您见笑了”。Thomas曾经举过英国人向游客为当地的天气道歉的

例子,借以说明西方人道歉并不一定是为自己的过错^{[10] p.100})。这同样也是一种“莫须有”的道歉。但是,尽管这同样不涉及道歉者的过错,但它与特殊的中国式道歉还是不同,即它道歉的内容毕竟是真实的,就天气这个例子来说,天气确实是糟糕的,并会损害道歉对象的利益。中国主人的上述道歉则是彻彻底底的“谎话”。甚至可以说,主人在为几乎无可挑剔的饭菜道歉时,内心可能正期待着被客人“揭穿”谎言的那一刻呢。所以,道歉很多情况下的“导火索”并不一定是“过错”,而是社会的礼貌准则。在中国,礼貌的准则尤其复杂和重要。它们规范着人们在特定场合下说特定的话,否则既定的社会秩序就会打乱^{[10] p.239})。

针对b条件“过错”一定要已经发生吗?也不尽然。出于礼貌,在“过错”没有发生之前,人们很可能先道歉。事先致歉说明说话人知道他将要说的话或做的事不甚恰当,但由于需要,又不能不说或不做^{[11] p.126})。如“对不起,打扰一下。”“明天要出差一趟,不能多陪您了,见谅!”鄙人愚笨,若有犯错,还望多多担待。”Thomas将这种情况形象地比喻为:“先道歉,再砍你的头!”^{[9] p.100})这时的道歉行为发生在说话者形象受到损伤、社会秩序发生混乱之前,也就是说道歉的功能由“修复”变成了“预防”。Meier的道歉理论显然未将这种情况纳入考虑。虽然在英语里也不乏此类“预防”式道歉,而且也引起了语言学家的注意,例如,1983年Olshtain等^{[12] p.20})指出,道歉是在人们的语言或行为违反了社会常规(不管这种违反是真实的还是潜在的)的情况下产生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未雨绸缪的道歉对于中国人格外重要。贾玉新在解释为什么中国人道歉频率非常低时,强调了中国的“强语境”文化的作用(笔者认为,他所指的主要是过错后道歉)。“在这种文化中,人们惯于采用预防措施避免冲突的发生。减少了冲突,人们的交往也就减少了对抗。大家相安无事,不轻易冒犯别人,道歉自然是低频率的。”^{[13] p.385})笔者认为,贾先生所提到的预防措施除了行动上的,还应该包括语言上的;“预防”式道歉就是其中的一种。与其事后修修补补,中国人更愿意先打好“预防针”。

(二) 修复”的结果

从“修复”的角度出发,Meier认为,道歉的目的和结果是最大程度地回复到过错发生前的状态,即道歉者的形象、道歉双方的关系得到所谓的“修复”。表面看来,情况的确如此。但是,笔者认为,这种“修复”的说法与中国式道歉的本质是有所偏差的。一方面,对于“无中生有”式道歉和“预防式”道歉,道歉的结果是双方关系的巩固和加强、道歉者良好形象的建立,而与“修复”毫无关系;另一方面,即使是过错后的道歉,中国式道歉似乎时常与“修复”功能背道而驰。这种“反修复”功能最直接的结果和表现就是中国人道歉的频率低和范围窄,因为道歉有时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使关系疏远。西方人对哪怕再轻微的冒犯(例如碰撞、打喷嚏、让路)也会说声“sorry”或者“excuse me”,而中国人是不轻易道歉的,如贾玉新的一组对比例子:

(2) A给B打电话,她等了一会儿,朋友才来接。)

A:你怎么上气不接下气呢?

B:我刚跑上楼,我刚才在下面的办公室。

A:对不起,我应该给你办公室去个电话。

(3) A给朋友B打电话,A持机等了一会儿。)

A:我等了这么半天,你才回话。

B:我刚跑上楼,刚才在楼下呢。

A:噢,我说你怎么会耽搁这么长时间呢。

其中,例(2)发生在美国,例(3)发生在中国。贾玉新^{[13] pp.375-376})指出,与例(2)不同,例(3)中的B仅仅是表明自己明白了对方的情况,并没有道歉。笔者还想补充的是,面对A的责怪,B其实

也可以说诸如“对不起,让您久等了”之类的话,然而,他选择了说清楚情况,而不是直接道歉。

以上分析并不能说明中国人没教养、不懂礼节。中国人之所以不道歉,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认为道歉并不能带来和谐和稳定,甚至可能正是道歉导致了不协调和冲突。在中国,关系亲密的人之间、上级对下级、长辈对晚辈,道歉会带来尴尬或疏远的感觉,破坏正常关系。不道歉反倒能实现“修复”的效果。中国人采取的不道歉的策略,是他们根据自己与听话者的权势关系(上级对下级)以及亲密关系(丈夫对妻子)做出的理性选择。如果必须要赔礼道歉该怎么办呢?中国人往往会退而求其次,采用间接道歉的形式,这种间接式的道歉在某种程度上能同时满足听话者和道歉者的面子需求,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尴尬,但是较之面对面的道歉会好得多。于明的《礼仪全书》把间接道歉归纳为四种:书面式、转达式、替代式(例如,把一件小礼物放在对方的餐桌上或枕头下表明歉意);改正式(用行动弥补)^{[13] p.132}。间接道歉的普遍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直接道歉的不完美性。当然,中国人不可能完全舍弃道歉。但是,在实际发生的道歉中,我们依然可以找出“反和谐”、“反稳定”的影子。请看以下例子:

(4) 乙是甲的上司,甲在一份上交给乙的材料里写错了一个数字。

甲:我真是太大意了,老板您交待的这么一点小事我都要出错,将来怎么做得了大事。还有,要是这样的错误发生在公司的正式文件里,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啊。老板您批评得太对了,我一定好好反省反省……

甲不过犯了一个小错误,他的这番道歉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犯过错的严重性。与一般“实事求是”的道歉不同,这种“过度”的道歉的结果是不和谐,有时会使道歉对象因道歉内容和道歉者的态度感到不安,被迫开始反向道歉,如:

(5) 甲和乙是朋友,甲邀请乙到家中做客,乙准备了一份礼物。

乙:实在是不好意思,来得太匆忙,随便给孩子买了点吃的,小小心意,还望不要嫌弃。

甲:哪里哪里。您太客气了,本来只想请您来寒舍坐坐,没想到您还买这些东西,这让我们怎么过意得去啊……

乙的道歉并没有带来 Meier 所描述的“和谐”的结果,反倒让甲感到了“过意不去”,出现对话双方争相道歉的有趣现象。当然,中国式“过度”道歉带来的不和谐是一种“快乐”的不和谐。通过“贬己尊人”,道歉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巩固了双方的关系。因此,道歉双方乐此不疲。

(三) 对 Meier 模型的修改和完善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中国式道歉有它独特之处,一方面,中国有强烈的礼貌准则约束,是道歉的直接动因之一,换句话说,中国人有时道歉并不是因为冒犯了对方;另一方面,中国式的道歉常是“过度”的,是“反和谐”的,中国人有时宁愿选择不道歉或间接道歉。笔者认为 Meier 提出的道歉理论模型不够全面,并在此提出了修改和完善建议(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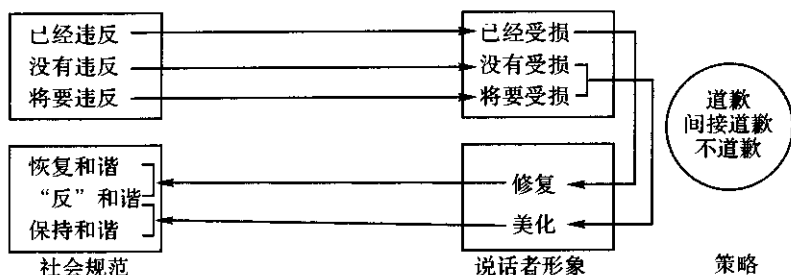


图 1 经过完善的道歉模型

表 1 经过完善后的道歉新模型

	社会规范→	说话者形象→	策略→	说话者形象→	社会规范
莫须有的道歉 (例 1))	没有违反	没有受损	道歉	美化	保持和谐
预防性道歉	将要违反	将要受损	道歉	美化	保持和谐
躲避道歉 (例 3))	已经违反	已经受损	不道歉	修复	恢复和谐
过度道歉 (例 4))	已经违反	已经受损	道歉	修复	“反”和谐(以强调道歉人愧疚)
互相道歉 (例 5))	没有违反	没有受损	道歉	美化	“反”和谐(导致反向道歉)

当然,现实生活中绝对不止这五种道歉情境,笔者只是以此为例说明 Meier 模型至少在中国语境下是不完备的,而经过完善后的新模型(表 1)可以较好地解释一些特殊形式的中国式道歉。

语用学里对道歉的研究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前后可分为两个阶段。在否定了 Brown 和 Levinson 的“礼貌/面子”理论的基础上,Meier 提出了“修复工作”的观点。这种观点有它的合理性,但也不完备,主要体现在文化局限性上,使得它不能或难以恰当解释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一些道歉行为。具体地说,中国式道歉主要有两个特殊之处:一方面,对于道歉的起因,过错并不成为中国人道歉的必要条件,中国人可能在无过错的情况下也道歉,或者在有过错之前就道歉;另一方面,对于道歉的结果,中国人的道歉可以是“反修复”、“反和谐”的,也就是说,并不完全会带来像 Meier 所提出的“修复”、“和谐”、“稳定”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中国语言环境里才会出现道歉频率低、上级和长辈很少对下级和晚辈道歉、间接式道歉多、过度道歉等现象。

在借鉴和吸收 Meier 成果的基础上,笔者提出的新模型综合考虑了普通的道歉和中国语境下的特殊道歉,相比 Meier 的研究有所推进。笔者将道歉的出发点分为“社会规范已经违反”、“没有违反”和“可能违反”三种情况,它们分别引发说话者形象“已经受损”、“没有受损”和“可能受损”的对应情况。无论是何种情况,人们可采取的策略既可以是道歉,也可以是不道歉或者间接道歉。对于道歉的目标,笔者认为,说话者形象得到修复(Meier 的研究重点)或美化(本文的研究重点),而社会规范方面,可以有恢复和谐(Meier 的研究重点)、保持和谐或者“反”和谐(本文的研究重点)三种情况。当然,上述模型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笔者真诚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对此提出宝贵意见。

[参 考 文 献]

[1] Al-Zumor Abdul Wahed. Apologies in Arabic and English : an interlanguage and crosscultural study[EB/OL].
http ://www.lboro.ac.uk/departments/ea/politeness/apologiesinarabicandenglish.htm ,2003 - 06 - 17/2005 -
02 - 12.

[2] Brown P. ,Levinson S.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3] Leech G.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 London :Longman ,1983.

[4] Holmes Janet. Apologies in New Zealand English[J]. Language in Society 1990 ,19(2):155 - 199.

[5] Meier A. J. Passages of politeness[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5 ,(24):381 - 392.

[6] Meier A. J. Defining politeness :universality in appropriateness[J]. Language sciences ,1995 ,(17):345 - 356.

- [7] Meier A.J. Conflict and the Power of Apologies[EB/OL]. <http://www.fu-berlin.de/phin/phin30/p30t1.htm>, 2004-11-19/2005-02-21.
- [8] 索振羽. 语用学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9] Thomas, Jenny. 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M].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Inc., 1995.
- [10] Gu Yueguo. Politeness Phenomena in Modern Chinese[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0, (14): 237-257.
- [11] 杜学增, 胡文仲. 中英(英语国家)文化习俗比较[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 [12] Olshtain E., Andrew D. Apology: a Speech Act Set[A]. Wolfson N., Judd E. Socio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C].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1983.
- [13] 贾玉新. 跨文化交际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 江予新]

Pragmatic Studies on Apologi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eier’s Repair Work”

JIANG Jing-yang, HU R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e pragmatic researches on apology can be roughly classified into two approaches. The first is based on Brown and Levinson’s “face/politeness” theory; the second is Meier’s “repair work” view. The present paper will focus on Meier’s “repair work” and initiate some disagreements and criticism. Through analyzing Chinese apologies, or to be specifically,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apologie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inadequacy of “repair work” model. In regard to the cause of the apologizing act, required by politeness norms, Chinese may apologize “out of no reason” (we term this “groundless apology”), and the apologies can take place before the real offence (we term this “preventive apologies”), in addition to apologizing after it, which is the only case studied by Meier. Thereby, the face of the apologizer could either be threatened, not threatened, or to be threatened. In any of those circumstances, Chinese might use indirect-apologies or simply choose not to apologize at all to achieve the same or even better effect than that of apologizing. The Chinese especially prefer doing so when they are speaking with close friends and relatives, or with people younger or at lower social status. The reason is that the result of apologies in China is not necessarily equilibrium but can be ‘over-equilibrium’. The goals of apologies (as well as non-apologies and indirect-apologies) are not only to ‘repair’, but also to remain or to enhance the face of the speaker, when the “preventive apologies” and “groundless apologies” are concerned. In short, the revised model we propose is far more complicated than Meier’s “repair work”, in which the apologies only occur after certain offence and with the only purpose of regaining the equilibrium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However, we can never claim that our model is perfect and universal; more research is called for, especially when applied to different cultures.

Key words: apology; Brown & Levinson; “repair work”; equilibrium; Chinese apologies